

# 西汉巨量黄金的来源及消失的原因、 时间、地点考<sup>\*</sup>

唐任伍

**内容提要:**西汉多黄金并于东汉消失的命题一直为古今学者关注。西汉黄金总量大约在1 000吨左右,主要来自西汉以前历代积累、统治者的搜刮聚敛、冶炼技术提高后的生产以及海外贸易进口。有关进入东汉巨量黄金消失的“佛寺消耗说”“海外贸易流失说”“黄金系黄铜说”等论点均不成立,西汉巨量黄金大多因西汉的厚葬、聚财意识,战争以及东汉后黄金支付功能的消退、储藏功能上升,而被陪葬和窖藏在皇陵、诸侯王墓室及富商大贾活动的地方。1999年西安东北郊未央区一次性发现219枚西汉金饼与2015年西汉废帝刘贺海昏侯大墓一次出土378件纯度达99%的金饼,是这一考证最重要的证据。

**关键词:**西汉 巨量黄金 黄金窖藏

笔者曾于1989年发表《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一文。<sup>①</sup>文章刊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汇报》等媒体或全文转载,或观点摘引。2015年,南昌西汉废帝刘贺海昏侯大墓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各类文物珍品1万多件,其中包括纯度达99%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及金器378件,重达128公斤,数量惊人;还有五铢钱10余吨近200万枚。<sup>②</sup>这一发现,证明了上文考证结论的正确性,多家媒体再次将其翻出,广泛转载和引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以此文作为框架和线索,专门制作了有关黄金探宝的节目。基于此,笔者想再次结合出土的一些新证据和新材料,进行更深入的考证,回答有关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 一、西汉的黄金量及其来源

汉代多黄金。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专门做过统计,西汉一代用于赏赐的黄金数量大约有近百万斤。<sup>③</sup>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1斤折合今日248克来计算,终西汉一代,皇帝赏赐的黄金量当在250吨左右。这仅仅是赏赐一项,如果加上国库、皇亲贵族、诸侯拥有的以及流通中的黄金,数量或当可以翻数倍,大约在1 000吨左右。

2016年底,我国黄金储备为1 808吨。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持有者美国是中国的4倍多,达8 134吨,德国3 380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 814吨,意大利2 452吨,法国2 436吨,俄罗斯

[作者简介]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史”(批准号:11JZDMG086)阶段性成果。

① 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

② 郭晶:《传奇发现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江西画报》2016年第3期。

③ 据统计,具体赐金情况为:高祖42 550斤,惠帝68斤,高后110 009斤,文帝12 000斤,景帝1 102斤,武帝806 940斤,昭帝2 420斤,宣帝680斤,元帝540斤,成帝3 660斤,哀帝680斤,平帝200斤。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 499 吨,全球黄金总量达到 32 733 吨。<sup>①</sup> 因此,可能有人怀疑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黄金总量根本达不到 1 000 吨的水平。但是,如今官方公布的黄金数量只是对以储备形态保存在国库中的金砖的统计,仍有大量黄金存在于民间私人手中,更有巨量黄金存在于工业消费、建筑、宗教和居民的生活消费中。而汉代的黄金基本是以财富和货币形态存在于国家和上层阶级手中,没有工业消费,生活消费用金也很少,故 1 000 吨应该比较可信。

至于汉代巨量黄金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笔者认为大致通过下列几个途径:

一是历朝历代的积累。黄金,以其特有的色彩和不腐、不烂、不变质的特性,吸引着历代王公贵族。中国地大物博,大自然中天然的黄金数量不少。春秋以前,黄金就已成为人们追逐的宝藏。到战国时期,各国王公贵族、各路诸侯都把黄金看作宝贝,无不千方百计地搜罗。当时,秦国和楚国势力最大,财富最多。楚国汝汉地区盛产黄金,淘采出来的黄金被制成金钣,金钣上面钤有方形或者圆形的小印,习惯上被称为“印子金”。因其呈方形流行于世,以“爰”作为当时的货币重量单位,故又称为“爰金”或“金爰”。金钣上的铭文以地名或国名作标志,有郢爰、陈爰、专爰、覃金、隔爰及卢金等,尤以楚国都城“郢”命名的“郢爰”为盛。国力强盛的秦国统一天下后,包括黄金在内的各国财富,自然都归聚于秦王朝的国库。楚汉相争,刘邦最先进入咸阳,秦国国库悉数归刘邦所有,历代积累的黄金最终都转移到了西汉。

二是统治者的搜刮和聚敛。汉代文献中记载的巨量黄金多用于赏赐和贿赂,表明当时的黄金尽管可以作为货币,但很少用于民间日常交易。西汉时期,民间日常交易主要使用铜钱。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三官五铢钱,每年铸造数目巨大,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至汉平帝元始五年(5)期间,国家共铸造了钱币 280 亿枚。<sup>②</sup> 西汉桓谭在《新论》一书中记载,当时国库与皇室的年收入高达 123 亿钱,大都用于日常生活用品交易。<sup>③</sup> 黄金没能用于日常生活交易,主要是民间存留的黄金很少,多被统治者搜刮。西汉实行酎金律,就是皇帝以向祖宗宗庙祭献的名义,强制让各地诸侯按照人口数量向皇帝敬献黄金。各地诸侯则将搜刮的黄金做成金饼状,成色和纯度都有严格规定。汉文帝时政府明文规定,每年八月在首都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的人口数量进献黄金用来助祭,每千人进献黄金 4 两,余数超过 500 人、不足 1 000 人的小诸侯国也要按 4 两计算。<sup>④</sup> 以当时的中山国为例,人口 66.808 万,需要交纳 2 672 两黄金。故仅进献酎金一项,西汉政府每年就可以获得黄金 1 600 斤左右。<sup>⑤</sup> 加上其他方面的赋税收入,皇帝每年聚敛的黄金数量相当大。

汉代法律对于酎金的数量、大小、颜色、成色等均有严格规定,不符合规定者,则以“坐酎金”条例来治罪,汉代以该律条打击地方诸侯势力的案例不少。在诸侯敬献酎金时,皇帝亲自到场接受。如果诸侯和封王奉献的酎金份量或成色不符合标准,就很可能遭到削去诸侯国或其县的惩罚。汉武帝刘彻曾以酎金不足为名,削弱和打击诸侯王及列侯势力。酎金律成为汉朝政府用于巩固皇权、削弱地方诸侯力量的一种手段,“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sup>⑥</sup> 海昏侯墓室中出土的大量金饼,正是汉代酎金律的反映和印证,是海昏侯搜刮用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时的奉献和进贡,后因被贬而失去进贡资格留下来的一部分。通过酎金方式搜刮来的巨量黄金被铸造成麒麟趾形状,用于赏赐诸侯王和有功大臣,“更黄金为麟趾、蹠,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sup>⑦</sup> 当时的麒麟趾金

<sup>①</sup> 《新兴市场是黄金复兴的关键》,http://gold.jrj.com.cn/2016/09/22133421513594.shtml,2019 年 2 月 27 日。

<sup>②</sup> 王泰初:《西汉五铢钱的分类》,《收藏界》2013 年第 10 期。

<sup>③</sup> 《西汉货币:中国货币史的一个高峰》,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428/13/19962827\_466556988.shtml,2019 年 2 月 27 日。

<sup>④</sup> 李慕南:《农业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 页。

<sup>⑤</sup> 王刚:《从西汉黄金问题看抑商》,《安徽史学》2000 年第 3 期。

<sup>⑥</sup> 《史记》卷 30《平淮书》,新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0 页。

<sup>⑦</sup> 《汉书》卷 6《武帝纪》,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46 页。

和马蹄金，都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并非流通货币。

三是新方法带来产量增加。战国时期，很多地方可以生产黄金，而到了西汉，铁器广泛使用，找矿和采矿业迅速发展，西汉人在继承前代找矿采矿有效方法的基础上，发现了按照矿脉分布走向关系寻找新的矿藏和察看金光寻找黄金矿的新方法，按照新方法寻找黄金矿，导致更多黄金产地被发现。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扩展到两大流域的纵深地区，如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黄金出土，含金量多数在93%—97%之间。<sup>①</sup> 参与采金和淘金的人数逐渐增多，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开采黄金的机构和官员。而汉元帝时，由于采金和淘金者众多，导致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大臣贡禹专门提出了“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的主张。<sup>②</sup> 通过新方法的运用，大量黄金被源源不断开采出来，使得西汉国库更加充盈。

四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国商人遂来往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各国，商业往来非常频繁。西域国家以游牧为主，货币经济很不发达，甚至根本不懂得黄金的作用。相反，他们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单于好汉缯絮食物”，<sup>③</sup> 对蚕吐丝很感兴趣，甚至不相信这些丝织品是由吃树叶的小虫吐出来制造而成的事实，即所谓“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丝所成”。<sup>④</sup> 汉朝皇帝给西域来朝官员的赏赐也均是绵、绣、绮、谷、杂帛、缯絮、食物之类，根本没有黄金。汉朝商人通过中间商安息人，在由敦煌、新疆到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埃及的这条丝绸之路上与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带回来的主要也是黄金。<sup>⑤</sup> 这些黄金不仅来自有着充实国库的罗马，还包括沿途的叙利亚和埃及等很早就使用黄金作为对外支付货币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黄金，因此很愿意用黄金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美的中国商品。

汉朝商人与欧洲人做生意，也是用丝绸茶叶换取黄金，很少记载有用黄金去做生意的。当时罗马宫廷中的贵族将中国的丝绸作为奢侈品，以喝中国的茶叶、穿中国的丝绸衣服为荣。<sup>⑥</sup>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在论及罗马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时，认为中国的丝绸茶叶大量输入罗马后，罗马完全是以现金来偿付这些奢侈品，而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罗马的商品。罗马人对此抱怨颇多，认为花费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来购买中国价格昂贵的丝绸及其他各种商品货物。比如，有一种名为“缣”的双经双纬粗厚丝织物，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衣服、口袋及其他制品，每匹本来只有400—600多个铜钱，但是输出到罗马市场后，却几乎与黄金同价，即1两黄金才能购买1两缣。而1匹缣约有25两重，即可以换取25两黄金。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的统计显示，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1万赛斯脱奇（Sesterce，古罗马计量单位）黄金流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即约超过5吨黄金。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以至于罗马史学家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丝绸是一大漏厄，被视为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sup>⑦</sup>

## 二、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原因

东汉以后，西汉巨量黄金悄然退出了文献记载，很多学者均对此予以关注，并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佛寺消耗说。清代赵翼认为：“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

<sup>①</sup> 付鑫鑫：《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60f31e0102w9nt.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60f31e0102w9nt.html), 2019年2月27日。

<sup>②</sup> 《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965页。

<sup>③</sup> 《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2741页。

<sup>④</sup> 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8页。

<sup>⑤</sup> 闻风：《金灿灿的西汉王朝：巨量黄金从何而来》，<http://news.163.com/16/1018/10/C3LE20PS000187UE.html>, 2019年2月27日。

<sup>⑥</sup> 龙安：《丝绸：从古罗马延续至今的顶级奢侈》，[http://fashion.ifeng.com/a/20181012/40436431\\_0.shtml](http://fashion.ifeng.com/a/20181012/40436431_0.shtml), 2019年2月12日。

<sup>⑦</sup> 吴经熊等主编：《天下（Tien Hsia Monthly, 1935—1941）》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古老言:黄金做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sup>①</sup>即汉以后,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大兴,塑像涂金,泥金写经,贴金作榜,最为耗金之蠹。但此说显然无法解释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原因,因为佛教传入中国是南北朝以后的事,佛还未入,寺尚未建,又何谈塑像涂金、泥金写经、贴金作榜之举?

二是对外贸易流失说。该说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东汉后消失,是由于对外贸易导致黄金外流。彭信威指出,西汉黄金数量的减少,是由于黄金的外流(赏赐外人)和贸易的入超(向大宛买马、明珠琉璃)。<sup>②</sup>傅筑夫则认为,黄金最大的泄漏,乃是通过对外贸易而大量输出国外。<sup>③</sup>然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西汉对外贸易不但没有输出黄金,反而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巨量黄金,增加了西汉的黄金储备。

三是西汉黄金系黄铜说。西汉时期,黄金和铜同时流通,南昌海昏侯大墓中出土的纯度达99%的黄金和十余吨五铢钱就是明证,而文献中对于黄金和铜的区分也非常清楚。第一,西汉法律正式规定黄金是上币,铜钱是下币,两者之称呼绝不混杂。第二,单位不同。西汉时黄金单位由战国时的“镒”改为“斤”,而铜钱单位为“铢”。虽然西汉也铸造过“金五铢”,但数量极少,一般作为压胜钱(类似于现在的纪念币),为宫廷吉庆、赏赐和民间喜庆馈赠时所用,并不在市场上流通。<sup>④</sup>第三,黄金和铜钱具有无限法偿。《汉书·食货志》载:“黄金重一斤,直钱万。”<sup>⑤</sup>也就是说,当时的1斤黄金可以兑换1万五铢钱(铜钱)。如果是铜的话,则会出现以1斤铜原料换取1万个加工后的五铢钱的结果,似不符合常理。<sup>⑥</sup>第四,功能不同。黄金在西汉时主要用于馈赠、赏赐和贿赂,铜则主要用于铸钱和日常交易。第五,产地不同。黄金主要生产于荆南、江南豫章等楚地,铜则主要产于巴蜀益州和吴越之地。第六,主管机构和官员称呼不同。西汉时专设黄金和铜矿生产的管理机构,并任命相应官员,管理黄金的叫金官,如“桂阳郡有金官”;管理铜矿的有铜官,如“丹阳郡有铜官”。<sup>⑦</sup>此六证足以表明,西汉黄金非黄铜也。陈直亦明确指出:“近人有谓汉代黄金即指黄铜而言,其说未敢苟同。”<sup>⑧</sup>另外,包括西安郊区出土的219枚金饼、河北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金饼和海昏侯墓葬出土金器在内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再次印证了文献中记载的“金”是黄金,而非黄铜。

笔者认为,从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来看,都没有导致西汉的巨量黄金消失,其原因在于这批黄金充分发挥了储藏职能,以金币和金器等财富形态随葬和窖藏于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的故地。<sup>⑨</sup>而造成西汉巨量黄金被公私窖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西汉提倡厚葬,社会上追求“务崇华侈”。秦汉时,灵魂不灭观念、阴阳五行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等盛行,为厚葬之风提供了土壤。同时,统治者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的伦理道德,儒家孝道观念不仅成为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而且成为决定其仕途的政治标准,亦对当时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随葬丰厚成为很多人作为恭行孝道的最佳方式。至西汉中期,尤其是经历过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之后,厚葬更成为王权的象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墓室高大华敞。皇帝、诸侯的椁

<sup>①</sup> 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汉多黄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8页。

<sup>②</sup>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6页。

<sup>③</sup> 参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页。

<sup>④</sup> 目前出土的西汉“金五铢”数量极少,十分珍贵,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sup>⑤</sup> 《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967页。

<sup>⑥</sup> 由于1铢=1/24两,则5个五铢钱即为1两多;又由于1斤=16两,那么大约80个铜钱就是1斤。

<sup>⑦</sup> 《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1232页。

<sup>⑧</sup> 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7页。

<sup>⑨</sup> 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有关于此,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第556页)已提出:“在东汉不久以前的西汉年间,黄金原是上下通行,而且用金之数不仅是动辄百斤、千斤,而是动辄万斤、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对于公私窖藏,更是庞大惊人。”

室以“黄肠题凑”构成，武帝陵墓的明中高1.7丈，四周2丈，内设相当豪华。诸侯的墓室也高大无比，极有气派。至于所用棺椁，也是分等级，极尽华丽。<sup>①</sup> 第二，装裹奢华。汉代皇帝、贵族死后，从口中含的、身上穿的、戴的，随葬物品的多少和贵重，都有严格规定和安排。一般来说，皇帝死后饭含玉，诸侯饭以珠，大夫饭以米，士饭以贝，<sup>②</sup>皇帝死后穿金缕玉柙。<sup>③</sup> 第三，随葬丰厚。汉制规定，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sup>④</sup> 因而，汉武帝时期，每年以天下贡献的1/3充山陵，以至于“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sup>⑤</sup> 后虽遭赤眉军发掘，到晋代“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sup>⑥</sup> 史载，汉武帝茂陵中藏有大量仿照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七禽旋转铸造的金钱财物，共计百九十物。<sup>⑦</sup> 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出土的随葬品达4200多件；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珍贵文物1500余件（套）；大葆台汉墓因早年被盗，大部分随葬品已丢失，仍出土了400多件；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墓主是封邑仅700户的列侯夫人，其随葬品却数以千计。<sup>⑧</sup>

在帝王厚葬之风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互相仿效，相沿成习，而一般人家不惜“靡财殚币，腐之地下”。<sup>⑨</sup> 源出于此，老百姓每逢荒年而衣食无着时，便会铤而走险去挖坟掘墓，寻找墓中随葬品以图生计。对此，王符《潜夫论》卷3《浮侈》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襦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sup>⑩</sup> 当时之人多有感叹：“国费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酈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sup>⑪</sup> 有人甚至指出大汉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厚葬。<sup>⑫</sup>

第二，西汉时兴盛黄金拜物教和聚财意识。黄金不仅有装饰之美，更是一种财富象征。而作为古老的通用货币，黄金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权利、信仰、权威和地位的代表。马克思曾使用拜物教这一提法，指出“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sup>⑬</sup>

早在战国时期，秦惠王就通过黄金开道，进入并占领了蜀国，黄金拜物教观念已然存在。当听说楚地丽水中有沙金时，即便酷刑在前，前往淘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sup>⑭</sup> 战国晚期，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几年后，苏秦佩六国相印返家，使其“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其嫂一语道破，是因为“见季子位高金多也”。<sup>⑮</sup>

<sup>①</sup> 参见王旭晓《华夏审美风尚史》第3卷《大风起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79页。

<sup>②</sup>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杂记下第二十一》，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22页。

<sup>③</sup> 《后汉书》卷94《礼仪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53页。

<sup>④</sup> 《晋书》卷60《列传第三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4页。

<sup>⑤</sup> 《史记》卷12《孝武本纪》，第237页。

<sup>⑥</sup> 《史记》卷12《孝武本纪》，第240页。

<sup>⑦</sup> 王旭晓：《华夏审美风尚史》第3卷《大风起兮》，第80—81页。

<sup>⑧</sup> 在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中，钱币一项即多达17.6万余枚，楚王下属县令以上的铜官印和封泥达200方之多，完整而精美的玉器200余件，其中单是完整的玉璜就有70多件，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大葆台汉墓出土的400多件文物，包括铜器、玉器、玛瑙、铁器、漆器、骨器及丝织品等。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出土的鎏金龙头枕，中段为木枕，两端是铜鎏金嵌玉龙头，龙头作张口吐舌状，牙、舌和角为青玉制成，龙眼是两颗水晶珠，还有一件透雕螭虎玉佩，极其精彩。参见王旭晓《华夏审美风尚史》第3卷《大风起兮》，第81页。

<sup>⑨</sup> 《汉书》卷67《杨胡朱梅云传》，第2191页。

<sup>⑩</sup> 王符：《潜夫论》卷3《浮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

<sup>⑪</sup> 《后汉书》卷39《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481页。

<sup>⑫</sup> 王旭晓：《汉代人为何喜欢厚葬》，[http://news.ifeng.com/a/20160402/48310199\\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0402/48310199_0.shtml)，2019年2月27日。

<sup>⑬</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sup>⑭</sup> 黄建军译注：《列子译注：精编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7页。

<sup>⑮</sup> 《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935页。

“此一人之身，富资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位高金多”就是黄金拜物教现象的真实表露。<sup>①</sup>至西汉时，由于黄金购买力高，且价值稳定、携带方便，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黄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追捧，巨量黄金成为皇室及政府财政安全的后盾，普通老百姓则把拥有黄金作为安身立命、甚至养老送终的保证。《后汉书》载，广汉新都人王忳，“尝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悯而视之。书生谓忳曰：‘我当到洛阳，而被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王忳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sup>②</sup>

第三，黄金的分散化以及支付手段减退。西汉末年战乱酷烈频繁，汉成帝时先后爆发了四次工徒、农民起义，<sup>③</sup>汉哀帝时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为避免被抢被盗，富商大贾和官吏将黄金藏匿于鲜为人知的隐蔽处，侥幸图存以备用，或携家弃产仓皇逃命，有的死于荒郊野外，有的客居他乡，窖藏黄金财物从此湮没无闻。王莽改制后，继承了汉武帝以后昭、宣、元、成、哀、平帝六代西汉帝国的积蓄，并规定“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而“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匱”，实行了黄金国有化政策。<sup>④</sup>王莽去世时，其大肆搜括聚敛于国库中的黄金数量高达70万斤，形成中国古代黄金积蓄的最高峰，相当于罗马全国黄金的总数。<sup>⑤</sup>这些黄金被乱军和地方武装掠抢，大量散失于民间，导致黄金价格大跌。首都长安及三辅地区曾出现“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行情。<sup>⑥</sup>1999年，在西安未央区的两个竖井内发现219块金饼，说明坑的建造时间可能在王莽末年，黄金或是从国库中抢来的，或是富商大贾仓促中埋藏于官府大道附近的乱坟之中。<sup>⑦</sup>

进入东汉以后，文献中很少有帝王将相挥金如土、巨量赏赐和馈赠的记载，相反却看到一个个惜金如命的守财奴形象，表明到东汉后即使是那些王侯将相，手中持有的黄金数量也相当有限。自和帝以后，政局动荡，政府连年对外用兵，财政匮乏，黄金价贵，官私均乐于将稀缺的黄金作为财富窖藏起来，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随之减退，而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却有所增加，黄金从此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之物，流通中的金铸币越来越少，史书上也就很少记载了。

### 三、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地方

西汉巨量黄金，除少量被消耗以外，由于其本身独有的不腐、不烂、不会被氧化的特性，其余大多可能会以纯度较高的现货存于以下地点。

第一，陪葬于帝王陵寝中。西汉一代，死后大量的金银珠玉陪葬就是皇权的继续。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的长陵，由于汉朝刚立，国力有限，所葬黄金不会太多。继高祖位的惠帝刘盈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0里处的安陵，其所葬黄金也有限。平帝刘衍、孺子刘婴、淮阳王刘玄最终或被毒杀，或被乱兵所杀，因此墓室中不会有多少陪葬物，巨量黄金陪葬基本上没有可能。因此，西汉巨量黄金与上述帝王的陪葬应没有多大关系。

西汉巨量黄金以陪葬方式埋藏于地下应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等8位皇帝的墓室有直接关联。这些皇帝在位时间较长，其自身威望高，且在位时期国家稳定富庶，故有条件进行厚葬。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为文景之治的中兴者，国家进入经济繁荣时期。文帝葬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35里处的霸陵，景帝葬于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30里处的阳陵，其黄金数量不会太少。武帝刘彻在位时间最长（达54年），是汉代威望最高的皇帝，葬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17里处的茂陵，

<sup>①</sup> 黄成：《中国古代货币与中国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第967页。

<sup>③</sup> 即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等领导的起义。

<sup>④</sup> 《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2969、2978页。

<sup>⑤</sup> 参见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sup>⑥</sup> 《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第232页。

<sup>⑦</sup> 参见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其陪葬黄金数量值得关注。昭帝刘弗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13里处的平陵，宣帝刘询葬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15里处的杜陵，元帝刘奭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2里处的渭陵，成帝刘骜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15里处的延陵，哀帝刘欣葬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8里处的义陵（夷陵），这些皇陵应与西汉巨量黄金消失有着密切关联。由于西汉历代皇帝都有或多或少的黄金陪葬，导致在刘汉王朝皇祚断绝后，皇帝陵寝也遭受到空前破坏。三国时期军阀混战，诸侯四处杀伐，董卓曾专门派人盗掘汉代皇帝陵墓，获得大批金银珠玉。西晋诗人张载的《七哀诗》，专门描绘了董卓部众野蛮疯狂盗掘西汉皇陵的情景。<sup>①</sup>《后汉书》亦载：“何后（笔者注：汉灵帝妃）葬，开文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sup>②</sup>为了解决日益紧缺的粮饷，曹操还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类专司掘坟盗墓的机构和官职。

第二，陪葬于皇后、皇太后的墓室中。吕后垂帘听政，实际掌控大汉江山的时间比刘邦长得多，其陵墓建造比刘邦的陵墓多花了16年，虽然最终以皇后身份归葬长陵，但陪葬并不比长陵逊色，与刘邦陵墓几无差异，是西汉皇后陵墓中最为高大壮观的一座。<sup>③</sup>吕后去世时，曾留下遗诏，赏赐每个诸侯王黄金各千斤，<sup>④</sup>可见其收藏的黄金数量之大。

汉高皇后吕氏规定，聘皇后以黄金2万斤做聘金，<sup>⑤</sup>并成为西汉一代定制，如吕氏为惠帝娶鲁元公主女纳为皇后，即聘黄金2万斤。王莽以女为平帝后，按照惯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sup>⑥</sup>东汉时，亦行此制，汉桓帝聘权臣梁冀女弟为皇后时，“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sup>⑦</sup>东汉卫宏所著《汉旧仪》记载皇帝聘皇后只有黄金万斤，与《汉书》记载数量有所不同，但不损害皇后聘金的惯例。因此，下列皇后、太皇太后的墓葬中，不排除数量比较大的黄金存在：刘邦正室、刘盈生母、葬于长安咸阳东长陵的高皇后吕氏吕雉墓；葬于南陵的太皇太后薄姬墓；刘恒继室、刘启生母、与汉文帝合葬霸陵的孝文皇后窦氏窦漪房墓；刘启继室、刘彻生母孝景皇后王娡墓；刘弗陵正室、与汉昭帝合葬于平陵的孝昭皇后上官氏墓；刘询正室、刘奭生母、葬于少陵的恭哀皇后许平君墓；刘奭正室、与汉元帝合葬渭陵的孝元王皇后王政君墓。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到底有无黄金，还需要考古发掘来证实。

第三，埋藏在公主和外戚的住地和墓室中。西汉一代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公主，如鲁元公主、馆陶公主、堂邑公主、平阳公主（景帝刘启与王娡生）、阳信公主、南宫公主、卫长公主、当利公主、诸邑公主、石邑公主、平都公主、平阳公主（元帝与卫婕妤生）、阳阿公主等，个个都深得宠爱，所嫁夫君皆门当户对，权势与财富结盟，积累财富当不在少数。又如，汉武帝曾一次性赏赐平阳公主千斤黄金，“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sup>⑧</sup>故这些公主的墓室之中，黄金珠玉一定不会太少。

第四，埋藏在分封的诸侯王所在地。刘邦称帝后，采叔孙通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sup>⑨</sup>同时，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分封诸侯王国，郡国两制并行。先分封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为王，政权稳固之后，则以种种罪名取消异姓王爵，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sup>⑩</sup>并将刘氏子孙按历史上的一些

<sup>①</sup> 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417页。

<sup>②</sup> 《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第841页。

<sup>③</sup> 吕后陵墓的封土形状和刘邦的长陵相同，其封土底部东西长有155米、南北宽131米、顶部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封土高近32米，远望一如山丘，雄伟异常。参见张剑光、邹国慰、周志明《中国帝王后妃陵墓之谜》，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sup>④</sup> 彭海涛：《汉代政府对宗室的褒赏与惩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sup>⑤</sup> 《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2901页。

<sup>⑥</sup> 《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2978页。

<sup>⑦</sup> 《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138页。

<sup>⑧</sup> 《史记》卷49《外戚世家》，第750页。

<sup>⑨</sup> 《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第1553页。

<sup>⑩</sup> 《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第1567页。

封地名称封王。<sup>①</sup>这些诸侯王独霸一方,王国百官设置如同中央朝廷,可以自行设置岗位(自置吏)、任命2 000石以下官员。此外,他们“得赋敛”;拥有铸币权;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郡县官吏归诸侯王辖制;诸侯王甚至还有自己的卫队,指挥王国辖下的郡县军队。由此可见,西汉黄金可存于实力雄厚的各诸侯王手中。

由于地域不同,诸侯王的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sup>②</sup>是西汉初期实力最强、面积最大的诸侯国。<sup>③</sup>梁孝王在世之时就开始“斩山作廓,穿石为藏”,建造规模巨大的陵墓,而其陪葬物中“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sup>④</sup>这些丰厚的黄金陪葬成为后代盗墓者的首选对象。袁绍手下的名士陈琳,曾在为袁绍攻伐曹操前发布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讨曹檄文中,专门对曹操挖掘永城芒砀山梁孝王墓群的劣迹进行讨伐:“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sup>⑤</sup>而《水经注疏》亦载:“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sup>⑥</sup>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考古工作者对汉梁孝王墓群进行保护性发掘,在这个自三国时代以来就被反复盗过的墓群中,仍发掘出了金缕玉衣、大型玉璧等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2万余件。<sup>⑦</sup>

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378件黄金金器,重达250多斤,是迄今为止诸侯王墓室中出土黄金最多的考古发掘,相当于目前西汉墓室考古出土黄金数量的2/3。<sup>⑧</sup>这批黄金,一部分是刘贺继承了第一代昌邑王父亲刘髆的积累。据载,太始二年(前95年),汉武帝因狩猎时喜获白麟、见到了天马、在泰山发现了黄金,故借这祥瑞之气铸造马蹄金、麟趾金来纪念此事,并赏赐给各地诸侯王、列侯和有军功的大臣,刘贺的父亲刘髆就是受赏者之一。<sup>⑨</sup>另一部分则是刘贺准备好的献酎金。由于在出土金饼中,有一枚书写“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说明刘贺是预备献酎的,但后因刘贺被废,有大臣上奏称刘贺是“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sup>⑩</sup>于是刘贺被禁止参加长安祭祖和各种宗庙祭祀,失去了献酎机会,导致这些酎金最终成为了随葬品。

除此之外,江苏徐州楚王陵、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山东曲阜鲁王陵、山东济南汉济北王刘宽墓(双乳山汉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等墓中,都或多或少有黄金出土。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金银等文物1万多件,其中金饼43枚,包括汉代1两重的金饼40枚、1斤的大金饼3枚,以及两件金缕玉衣(金丝就重达1 800多克)和错金博山炉等金器。<sup>⑪</sup>中山国领14县,辖16万户66.8万人口,居20个诸侯国中第三位,两汉十七代中山王世袭达300余年,留下了大量的汉代中山王墓,仅河北定州就有王陵170多座,<sup>⑫</sup>所藏黄金数量当十分可观。

第五,埋藏在西汉时立下赫赫战功的文臣武将府院和墓室中。西汉历代皇帝对于做出卓越贡献的文臣武将,绝不吝惜黄金,按官职高低或功劳大小,论功行赏,动辄千斤万斤。从高祖刘邦至平帝、

<sup>①</sup> 有记载的封国包括:楚国、荆国、燕国、齐国、赵国、吴国、济北国、胶西国、胶东国、济南国、菑川国、城阳国、衡山国、后济北国、河间国、后燕国、淮南国、梁国、代国、后河间国、鲁国、后赵国、长沙国、中山国、后胶东国、六安国、清河国、常山国、信都国、真定国、泗水国、新燕国、广阳国、高密国、后楚国、定陶国、后中山国等。

<sup>②</sup> 《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835页。

<sup>③</sup> 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封彭越于梁王,建立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辖地包括砀、甾、杼秋、蒙、已氏、虞(今虞城)、下邑(今安徽砀山)、睢阳(今商丘)八县,共38 709户、106 752口。参见《史记》卷90《魏豹彭越列传》,第1178页。

<sup>④</sup> 《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822页。

<sup>⑤</sup> 安小兰:《中国历代檄文选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8页。

<sup>⑥</sup>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sup>⑦</sup> 《芒砀山文化遗存的惊叹与神秘》,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 1597414975285687473,2019年2月27日。

<sup>⑧</sup> 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sup>⑨</sup> 王纪洁:《珍品钱币入眼来(下)——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介绍》,《金融博览》2012年第4期。

<sup>⑩</sup> 《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088页。

<sup>⑪</sup> 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sup>⑫</sup>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289页。

王莽，都对立国功臣、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二千石吏、家令、医者等赏赐黄金，总数达80多万斤。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整理了汉代皇帝的黄金使用情况，“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sup>①</sup>但这还不是全部。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对于为其父刘邦办理丧事的人员，尤其是参与修造墓穴的人，按照不同品级以黄金进行赏赐：将军一级的赏40斤；年俸二千石的官员赏20斤；年俸六百石的赏6斤、六百石以下的赏2斤，其黄金赏赐量之巨可想而知。<sup>②</sup>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对参与诛诸吕有功的人员进行黄金赏赐，其中周勃5000斤，陈平、灌婴各2000斤，刘章、刘揭各千金。吴王濞反，招募能斩汉大将者赏赐黄金5000斤，列将3000斤，裨将2000斤，二千石1000斤。武帝赐卜式400斤。<sup>③</sup>元朔五年（前124），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汉武帝赏赐卫青及其部下黄金“二十余万斤”。<sup>④</sup>宣帝继位后，对王公大臣进行黄金赏赐，其中霍光7000斤，广陵王5000斤，诸王15人各百斤，孔霸200斤，黄霸百斤。<sup>⑤</sup>又如，王莽聘史氏女为后，一次用3万斤黄金作为聘礼，同时又赏赐孝单于黄金千斤，顺单于黄金500斤。<sup>⑥</sup>赐予文臣武将的这些黄金，只有少量被消费掉了，仍有大量可能以某种形式窖藏起来。

第六，窖藏在西汉时期富商大贾活动之地。《汉书》载，“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sup>⑦</sup>《史记·平淮书》载，西汉初期“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穀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借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例如，齐地的盐铁商人之间，使用豪奴逐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财富达到数千万；南阳孔仅“家致富数千金”；鲁曹邴氏“贯貸行贾遍郡国”，富至巨万。<sup>⑧</sup>这些富商大贾为了避免财物被偷盗或者被农民起义夺走，往往将黄金藏于隐蔽处，后因战乱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取出。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了西汉窖藏的金器、金币，其中仅马蹄金和金饼等黄金就达40多斤。<sup>⑨</sup>1999年11月，西安东北郊发现了219枚金饼，共计200多斤。金饼埋藏地既不是汉代国家金库所在地，也不是大型聚落村寨或富豪的坞堡，更不是在王公贵族的墓室中，而是深埋在荒郊野外中。这些金饼形状如扁的半球形，上面嵌有文字、戳记和符号，如“黄、长、吉、马、租、千、金”和“V”等，重量在247克左右，最重的达254.4克，与西汉黄金1斤等于248克的重量接近，金饼绝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擦痕和用较锋利的器具锯过的切割痕，而且一般出现在较大的金饼上，部分金饼上还有补贴金片的现象。<sup>⑩</sup>这种切割或补贴是为了使金饼保持统一重量，叫“平称”。显然，这些金饼绝不会是在太平盛世时窖藏的，如果没有战争和帝国灭亡等太大的社会动乱，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将一大批金饼藏于荒野，很可能是当时的关中富商在战乱中带着黄金逃命慌乱中窖藏所致。参与鉴定这批金饼的专家也认为，这批金饼埋藏和西汉末年推翻王莽新朝的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有可能是仓促存放的临时性窖穴。<sup>⑪</sup>实际上，1995年以前，就已经出土了金饼216枚。河南扶沟古城村、江苏盱眙南窑庄、安徽寿县、陕西咸阳、大连新

<sup>①</sup> 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汉多黄金》，第110页。

<sup>②</sup> 《金灿灿的西汉王朝：巨量黄金从何而来》，<http://news.163.com/16/1018/10/C3LE20PS000187UE.html>,2019年2月27日。

<sup>③</sup> 《海昏侯出土的金器多？汉代黄金数量更惊人》，<http://bbs.tianya.cn/post-no05-419165-1.shtml>,2019年2月27日。

<sup>④</sup> 《史记》卷30《平淮书》，第405页。

<sup>⑤</sup> 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汉多黄金》，第110页。

<sup>⑥</sup> 《汉代巨量黄金去哪儿了？是真金还是黄铜？快来围观海昏侯的黄金》，[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25/15/9165926\\_530455979.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25/15/9165926_530455979.shtml),2019年2月27日。

<sup>⑦</sup> 《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970页。

<sup>⑧</sup>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1629、1630页。

<sup>⑨</sup> 《盱眙出土战国晚期稀世珍宝》，《人民日报》1982年3月16日，第4版。

<sup>⑩</sup> 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sup>⑪</sup> 《西汉金饼迷踪西安出土219枚西汉金饼始末》，[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Q4MzY4Mw%3D%3D&idx=1&mid=400702691&sn=01c27e69673ae58867bb2bc3cf1ae40b](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Q4MzY4Mw%3D%3D&idx=1&mid=400702691&sn=01c27e69673ae58867bb2bc3cf1ae40b),2019年2月27日。

金等地先后出土了数量不等的西汉马蹄金、麟趾金。<sup>①</sup>它们的出现不仅印证了史书上西汉“多金”的记载,也表明富商大贾对黄金的窖藏是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重要原因。

黄金陪葬和窖藏并非西汉特有,后代也很普遍。唐高宗的随葬品价值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3,<sup>②</sup>武则天驾崩后全国1/3的金银珠宝被带进乾陵,<sup>③</sup>导致五代耀州刺史温韬领兵盗墓。“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sup>④</sup>唐末黄巢起义时,长安周围的皇陵又被发掘殆尽。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时,刘豫成为被金国扶植建立的“大齐”的傀儡皇帝,其立国之初每年须向金国上缴年贡黄金1.5万斤、银5万斤,另有数以十万计的布匹、粮食、牲畜等。为了向金国缴纳近似于天文数字的“岁贡”,刘豫专门设置“淘沙官”负责盗墓。绍兴二年四月时,“河、淮、陕西、山东皆驻北军,麟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sup>⑤</sup>正如苏轼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三十万斤。陈平用肆万斤间楚,董卓郿坞金亦多,其余赐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不可知,复归山泽耶。”<sup>⑥</sup>事实上,“复归山泽耶”的推测不无道理,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宝货神不可知”,而是人们有意为之。

## The Source of the Huge Amount of Gold and the Reason, Time and Place of Disappearanc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ang Renwu*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ost much gold and disappear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for scholar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conducted a textual research in 1989. The total amount of gol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about 1000 tons, mainly from the accumulation befor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search and collection of the rulers, the production of improved s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ort of overseas trade. After the ent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rgument of “Buddhist temple consumption” “the loss of foreign trade” “gold system brass” and other arguments were not established. Most of the gol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buried and hidden in the imperial tombs, the princes’ tombs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rich businessmen live, because of the thick burial and wealth consciousnes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fierce war as well as the decline of the gold payment function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rising of the storage function. In 1999, 219 Western Han gold cakes were found in the ten Li Pu village in the North ten northeastern suburb of the northeastern suburb of Xi'an, and 378 pieces of gold cake unearthed at the tomb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te emperor in 2015 were unearthed at once,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examination.

**Key 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Great Amount of Gold, Gold Cellar

(责任编辑:丰若非)

<sup>①</sup> 呼林贵、尹夏清:《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sup>②</sup> 《海昏侯出土的金器多?汉代黄金数量更惊人》,http://bbs.tianya.cn/post-no05-419165-1.shtml,2019年2月27日。

<sup>③</sup> 《揭秘:武则天墓中陪葬品曝光,太震惊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50580695911826,2019年2月27日。

<sup>④</sup>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温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9页。

<sup>⑤</sup> 《宋史》卷475《列传二三四·判臣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96页。

<sup>⑥</sup> 苏轼:《仇池笔记》卷下《论金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